

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二十周年专栏

——回顾与感言

摘要: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是古代蜀文明里程碑式的发现。它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都邑所在地,经过二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材料正陆续整理公布。“祭祀坑发掘日记”、“出土青铜器的修复情况”和“三星堆遗址历年发掘”介绍了二十年来三星堆遗址工作概况。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纪念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962(2006)03 - 0083 - 14

一、三星堆遗址考古大事纪要

1929年 在三星堆遗址真武村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

1931年 英国神父董宜笃四处奔走,使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大部分归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

1932年 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提出在广汉进行考古发掘的构想并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批准。

1934年3月1日 葛维汉、林名均抵达广汉。

3月 葛维汉、林名均等在真武村燕家院子附近清理玉石器坑,并在燕家院子东、西两侧开探沟发掘,发掘面积55.65平方米。

1951年 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等调查三星堆、月亮湾,首次发现大片古遗址。

1958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再次调查三星堆遗址。

1963年 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312.5平方米。由著名考古学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汉骥先生主持。

1980年~1981年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首次大面积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揭露出大面积的房屋基址。

1982年11月~83年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二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并发现陶窑一座。

1984年3月~12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与广汉县联合,第三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在西泉坎发掘面积160平方米。出龙山时代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这次发掘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下限。

1984年12月~1985年10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广汉县联合,第四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发现三星堆土埂为人工夯筑,并调查发现东城墙和西城墙,首次提出三星堆遗址是蜀国都城看法。

1986年3月~5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县联合,第五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1275平方米,发现大量灰坑和房屋遗迹,将三星堆遗址的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

1986年7月18日 当地砖厂在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发现祭祀坑,挖出玉石器。第六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共发掘面积250平方米。

7月18日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联合发掘祭祀坑,编号为一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琥珀、石、陶等器物共420件,象牙13根。

8月14日 距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二号祭祀坑。

8月20日~9月17日 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石等珍贵文物1302件(包括残件和残片中可识别出的个体),象牙67根,海贝约

4600枚。

1988年10月~1989年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七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341.5平方米。对三星堆土垭进行试掘,确定土垭为内城墙的南墙。

1990年1月~5月 第八次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共发掘面积1075平方米。在东城墙发现土坯,首次了解三星堆古城城墙的结构、夯筑方法和年代。

3月 举行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铜树修复方案论证会,并对铜树进行预备。

1991年12月~1992年5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九次联合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837.5平方米。将西城墙进行试掘并得到确认。

1994年11月~1995年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十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700平方米。调查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南城牆,并进行了试掘。

1996年10月~11月 中日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环境考古工作,主要项目有磁场雷达探测、红外遥感探测与摄影、卫星图像解析、微地形调查、炭素年代测定、花粉分析、硅质体分析、硅藻分析等。

1997年11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十一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对三星堆遗址仁胜砖厂墓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934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8座,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的发现,引起研究者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文化渊源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1999年1月~2000年5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十二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450平方米。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城墙进行发掘,在城墙下发现大量龙山至商代早期的文化堆积,同时城墙又被殷墟时期的堆积叠压,从而可以确定月亮湾内城墙的年代为殷墟早期,共发掘面积450平方米。

2000年12月~2001年7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十三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在燕家院子发现大量三星堆第四期

的文化堆积,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的文化面貌和年代下限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发掘面积550平方米。

2005年3月~4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十四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在青关山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发掘面积750平方米(含西城牆水门)。

附:历次调查、发掘简报及成果

1、《汉州发掘简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1934年第6卷。葛维汉(1934年发掘)。

2、《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王家祐、江甸潮(1951年调查)。

3、《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1958年调查)。

4、《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1980—1981年发掘)。

5、《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县文化教育局。

6、《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所(1986年发掘)。

7、《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马继贤(1963年发掘)。

8、《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1987年调查,大事纪中无此项)。

9、《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发掘)。

10、《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1997年发掘)。

(陈德安)

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日记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是出于一个偶然的
机会,那是1986年的7月18日砖厂职工在三星堆
遗址第二发掘区取土时,在距地表深约两米之处
挖开一号祭祀坑东侧底部的一角,出土石器十余
件,当时在场的农民工立即报告了我们。那时我
和陈德安还有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勤工俭学的学生
朱章义、张广彦、刘章泽几个人正在三星堆遗址
砖厂宿舍(现三星堆工作站所在)内整理三星堆遗址
上半年的发掘资料,我们接到这个报告后立即赶
到距我们整理驻地约100米远的现场。

到现场一看,大家都感到非常吃惊,出土的玉
石器有玉戈、玉璋等,全是一些礼器,而这些器物
就出在我们今年上半年(2~6月)发掘的第二区,
而且离原发掘点仅2.30米远。这一发现让我们想
到在此之前在这里发现的两个小坑也出土有少量
的不同类型的文物,这两个小坑是否与该处出土
文物有关,不得而知。但是出土玉璋、玉戈这一处
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遗迹现象呢?谁也不知道,
不管怎样它总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于是我们开始
准备发掘工作。为了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
先把挖出文物的地方的坑角进行了回填,以便
保证发掘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我们也尝试了夜间的考古发掘。首次的夜间
考古发掘工作对我们在场的考古人员来说都是
比较新鲜的。没有任何经验,凭着一股热情和认真
就在夏日的夜间干开了。我们用竹子和麦草在现
场搭了一个棚子供工作人员放物或小憩,另外又
盖了一个与“墓坑”大小的棚子,这个棚子是活
动的,太阳太烈时和下雨时,它可以遮阳避雨,需
要照相绘图时可以把它整体抬起,更重要的是晚
上它还是我们夜间工作灯光的唯一支架。夜间发
掘时,上半夜还有周围的农民来看热闹,因为是
夏天,后半夜就显得非常宁静,周围除了蟋蟀的
啾啾之声和一片蛙鸣之外就是考古人员在坑中
偶尔的说话声和手铲插土、刮泥的沙沙声响。
到快天亮的时候,眼睛就比较困了,倦意不断上
升,但是大家依然坚持工作。

二号祭祀坑的发现是在8月份,8月的天气
与7月的天气相比又是一番情景,白天气温高
升,考

古人员汗流浹背,热浪袭人,有时又是大雨和
雷阵雨,晚上虽然有蟋蟀和青蛙的共鸣之声,但
又免不了蚊虫叮咬之苦,飞蛾扑灯带来的影响,
我们的发掘工地又是在稻田的包围之中。快到
天亮时湿气袭身,此时的考古队员可以说既疲
惫又肌肠碌碌。

一号祭祀坑发掘日记

7月21号 我们开始在第二发掘区发现出
土文物的地方进行布方,布方的方法是先找到
我们上半年发掘探方86GSII区T11的西北角
的点,然后由这一点向西引出30米,再向北引
出70米(探方在向西、向北30米的交汇点布
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新布的探方纳入
本区发掘探方的统一编号之中。由于不知道地
下的情况和坑的大小,因此只布了两个5×5米
的探方,编号为86GSIT939、T940。

7月22号 今天开始发掘,但两个方的发
掘并不是同时进行,首先对T940进行发掘,下
午开始T939的发掘。第一层为黑色农耕土,厚
9~14厘米,第二层为褐色土,土质较湿松,内
含有少量的褐色土粒,厚5~15厘米,在二层
下发现灰坑1个。编号H1。灰坑开口于二层下,
呈不规则状,坑壁较直,壁被火烧过,坑底的
呈环形,坑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内含大量的红
陶土块,在接近坑底的地方有一层厚约10厘
米的木炭层,坑内出土陶片10片,其中泥质
灰陶七片、夹砂褐陶3片。

7月23号 新增探方T1040,该探方是一
个不全的方,因取土而破坏,并挖掉坑的东南
角,也是在这里挖出玉器的地方。今天在二层
下又发现四个坑洞,一号洞位于T940探方的
西壁,其中一半压在T939的东隔梁下,洞的直
径为40厘米,洞底内又有一个小洞,直径16
厘米,整个洞深68厘米,洞内填土为黑色土,
较湿松,包含物有红烧土块及大量的木炭,疑
是一个柱洞。二号洞位于T840的西北部,距
一号洞16厘米,一半压在T939的东隔梁下,
洞内未发现遗物。三号洞位于T940的东壁,
四号洞紧邻三号洞,两个洞内填土为较纯的
黄色沙土,四号洞中出土1片夹砂褐陶。下午
对探方的平面和壁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大家认
为出土玉璋的墓葬开口应快出现了。初步估
计墓葬就在

这里,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墓葬,其平面分布范围可能超过了已开方的平面范围。

7月24日 根据昨天的情况,我们开始增布探方T941,并即刻开始发掘,直到与其它探方的水平面差不多时停下,再与其它探方保持共同的进步。同时也把几个探方的地层统一了。地层的初步统一为七层,第一层为农耕土,内含有许多的植物根茎,较湿松软,厚9~13厘米。第二层为灰褐色土,较松,内含褐色土粒和零星星的烧土颗粒,厚3~15厘米。第三层为黄色沙土层,含沙量较大,出土极个别夹沙陶片和灰陶片,器形难以辨认,本层厚18~22厘米。第四层为黄褐色土,较第三层硬,含沙少,内含较多的褐色小颗粒,包含物有极少数的泥质灰陶片和夹砂褐陶,在该层分别发现宋代的残墓葬和灰沟等遗迹。本层厚2~21厘米。第五层,为浅黄色土,土质较硬,内含少量的夹砂红陶片及呢质尖底罐残片,本层厚5~13厘米。第六层为红黄色土,土质结构密度大,较粘、板硬,内含有红色胶泥,发现有泥质灰陶尖底罐的残片。第七层为红色胶泥,生土层,距地表深度51~60厘米。

7月25日 上午打几个方的隔梁,同时增布探方T1039,由于T1041的位置早被砖厂工人取土挖完,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方”,因为它与墓葬的两方相邻,故也把它列入此次探方编号的序列之中。这样一来一共有六个探方(实际上只有四个半探方),基本上可以包括该“墓”的范围。在打T940北隔梁时,在隔梁的第二层出有明清时期的青灰瓦片,在隔梁的六层下发现墓的开口处,同时在T1039的东隔梁六层下也发现了墓的开口位置。

7月26日 今天将各方的隔梁打掉,以便将墓的范围都找出来。原来认为该墓坑可能是正方形并有四条墓道,中间一条,左右各一条。左墓道被三层下的宋代墓坑打破,右墓道被砖瓦厂取土挖掉,仅能看见拐角处一点痕迹。其分布范围主要在T1040,跨越T1039、T939、T940、T941。发掘工作到了当天收工的时候,我们把开方的整个面积全部刮完。工作到此时,我们也基本上弄清了这个墓葬的分布范围和结构形式。该墓开口于六层下,坑口距地表深50~80厘米,长442、宽370厘米,中间的主墓道长400厘米。

7月27日 上午,我们开始清理右边和中间

的墓道,及主要墓坑。右边的墓道和中间的墓道分别被三层下宋墓和宋代的灰坑打破。坑内的五花土很坚硬,但还比较纯净。在填土中只发现了个别的夹砂褐陶片。由于土质坚硬,全天发掘的深度为35厘米。

7月28日 继续清理坑里的填土,由于不知道填土下的情况,只能用小手铲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下掘,掘下去5至10厘米便在平面进行一次刮“地皮”似的搜寻遗迹现象。坑里的填土非常硬,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打起了泡。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仍然聚精会神工作,因为大家心中都明白,重大的收获即将来到。下午16点左右,在清理到距坑口约70~80厘米处时,土质从坚硬转变为较松湿的阶段,并在“左墓道口”至坑的前壁发现被火烧过的骨渣和木碳渣等。发现的骨渣都很碎小,颜色有白色、黑色、灰白色、蓝色等,在骨渣中还发现有孔雀绿的颜色,估计里面含有青铜器。发掘在继续,认识也不断地在变化,此时坑内的清理已不再是水平面进行,而是根据坑内的遗迹现象呈斜坡状的进行清理。从坡度的情况来看,这些骨渣和木碳沫是从左“墓道”倒入的。天渐渐黑了,鉴于遗迹出现的重要性,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进行24小时的作业。我们一边进行发掘,一边准备夜间工作的设施设备。晚饭后,夜间工作的准备工作就绪,我们就开始了首次的夜间发掘。

7月29日 经过一夜发掘,早上,覆盖在坑里骨渣上面的填土基本上清理完毕。可以看出这些骨渣全系火烧过后与木碳渣、灰烬及青铜器内的范土混合倒在坑里的。发现的骨渣其大小在0.5~3或者4厘米之间,其骨壁都很厚,由于骨渣都太碎,难于辨别是什么动物的骨骸,是否有人骨也不得而知。从发掘出土骨渣的堆积情况来看,大约有两立方米之多。骨渣的堆积,在坑的西南角最高,距坑口深只有45厘米,最底的是坑的西北角,距坑口深有135厘米。同时在坑的东北端遗物开始露头了。首先发现一对象牙和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和石璋、石戈的堆积之处。在坑的西北端发现了一节立起的“木柱”。晚上我们对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进行正式分班,便于24小时工作。

7月30日 凌晨,白天发现的“木柱”原是被火烧过的象牙,发掘工作越来越细,进入目前的工作可以说基本上靠竹签,几乎是一点儿一点儿进

行。在坑内清理约一半的范围时,已发现有10枚象牙,8个铜人头像,完全是仿真人头像大小而制作的。凌晨2点30分,当我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了出来,我继续清理,发现它是黄金制品,再继续清下去,发现上面刻有鱼纹,再继续,发现上面还有其它的纹饰,而且弯弯曲曲越来越长。此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条“金腰带”,为何这样想呢,因为在此之前,曾在什邡发现了一条十二生肖的金腰带,故有此想法。此时此刻,我一方面为这一重大的发现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这一发现感到紧张。我赶快把其他正在睡觉的人员叫起来,和陈德安商量如何应付目前的情况。最后我们鉴于目前在乡间野外,在没有任何安全的设施情况下,暂时对民工封锁这一消息,并决定:一、目前参加发掘的所有民工不得离开此地;二、由四川大学的学生张文彦同学立即骑自行车到广汉县城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县委县政府,同时请他们派保卫人员到现场保护文物的安全;三、由陈德安同志即刻起身返回成都,把这一重要发现向单位负责人汇报,我坚持在发掘现场继续作发掘清理工作。

清理工作在继续,发现的文物也越来越多,“金腰带”的清理也在继续,不久,这条“金腰带”的全貌也现了出来,原来这是一枚象征古代蜀王王权的“金杖”。上面除刻有鱼纹外,还有鸟纹和头戴王冠的人头像,总长为1.42米。早晨5点过一点,县委县政府在接到这一重要报告后,立即派出了36名武警战士到现场维持秩序。此时我才放下心来,并当众向大家宣布:“我们发现了古蜀王的金杖”。这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轰动,当天来看的人络绎不绝。

7月31日 我们基本上把坑里的骨渣清理完毕,坑里的器物分布也几乎全部展现在我们眼前。根据坑里出土文物及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坑里没有发现葬具及尸骨等情况,我们将其定名为“祭祀坑”。

8月1日 坑里的填土和骨渣清理工作基本结束,除了器物所在的地方,都能看到坑底的生土。从出土文物的质地来讲有铜器,其种类有人像、铜虎、龙、尊、瑗、戈等。金器有:金杖、金块、金树叶等。玉石器有:凿、斧、璋、戈、“剑”、斤、舌形

器等。象牙有门齿、白齿等。陶器有尖底盏、器座、器盖等。随后我们进入了绘器物分布土和编号取器物的阶段。取器物的方案是:坑内由我、代福生和一位民工三人负责编号取器物,包装内的标签由张文彦写,刘章泽和一个民工负责包纸、装箱,周科华负责坑里取物的编号与图纸上的编号一致,登记造册为朱章义,县文教局副局长袁绍清全程监督。

8月2日 上午取器物的准备工作就绪,下午按照昨天的分工开始从坑里取器物,步骤是按图上的编号起器物,器物取至8月3日凌晨两点,由于下雨,停工。

8月3日 下午雨停了,起器物的工作继续开展,当把一些上面的器物起走之后,有一些重大的发现,今天又发现一件金皮人面具和一尊小的青铜跪座人像,这尊小人像头高髻,圆眼、跪坐、两手放膝上,腰饰两条带,两腰带下又有一条从前面经裆部至后腰饰上,看上去此人似“光屁股”,该铜人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推测是一个“王者像”。夜里24点,器物取完,也全部装箱运回驻地,共计取出的器物500余件(含残件)。

8月4日 上午对坑底再次进行了清理,没有发现任何遗迹遗物,下午绘祭祀坑壁平、剖面图。至此正式结束了该坑的野外作业,民兵和武警人员也转入室内看守。

8月6日 我们在室内整理资料,省文物处的领导和省考古所领导在县政府协商文物的运回整理的问题。

二号祭祀坑发掘日记

8月14日 星期五,晴。我们正在砖厂整理祭祀坑发掘资料,至下午18点,砖厂挖土民工杨永成来报在距一号祭祀坑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文物,我即刻赶到现场,发现又是一个祭祀坑,发现的情况与一号祭祀坑一样,也是在挖“神仙土”时挖出来的(所谓神仙土,既是人们从陡坎的最底处向里挖空,然后再从最高处用刚钎倒土,这样一来可以省力,又可以一次倒下两、三方土)现已暴露出一个铜面具,并能看到其它的灰烬。当即要求砖厂停工,不得再在此处取土,并组织人力回填现场、保护现场,请民兵和在砖厂守护文物的武警首先赶到现场守护。同时也开始发掘的准备工作。在发掘工作的前夕,安排朱章义等人置办发掘后

勤所需物品,张文彦等人向县委报告,要求增派公安武警前来保护,我则在当晚9点30分回到成都将这一重大消息报告给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朱秉章、肖宗第、赵殿增、李昭和、廖永辉、陈德安和我。会议决定:一、同意我的现场停工决定,二、提高保卫值勤人员的待遇,三、派张瑛的车住现场以便联系和应付紧急情况,四、发掘工作仍由省县联合进行,发掘工作仍由二陈负责。会议到15日凌晨结束。

8月15日 星期六,雨。上午我们回到广汉开始与县政府协商发掘工作的事宜。下午,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川和广汉县委书记叶文志对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归属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同时许部长也把我们对三星堆的认识和重要性给叶书记谈了,并指示砖厂要停工,不能再这样取土了,这里需要保护。

8月20日 几经周折把文物运回所里进行相应的处理。

8月21日 组织人力开始布了四个5x5米的探方,其统一编号为86GST442、443、542、543。方向为正北。县政府也把公安武警人员派到了现场。至晚上23点收工时,基本上揭完了农耕土和二层灰黑色土质。

8月22日 继昨天的发掘工作,我们在第二层下发现了5个灰坑,在清理完这5个灰坑后进入第三层。在发掘到距地表40厘米左右,天开始下雨,只好在晚上23点30分收工。

8月23日 雨整整下了一天。

8月24日 在清理完T543、443、442第三层下的一条大沟后,在第五层下发现了二号祭祀坑坑口的开口位置,坑口距地表深度为55~40厘米,同时还发现了其他四个灰坑。我们先把灰坑清理完后对祭祀坑进行清理发掘。同时我们把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又作了一次调整,调整如下:16:00—24:00由陈德安、张文彦负责,带五个民工,凌晨0:00—早上8:00我和刘章泽负责,同时带五个民工,早上8:00—16:00由朱章义和敖兴全负责,同时带五个民工。

8月25日 由于考古发掘停了砖厂的生产,乡政府找到县上要求恢复生产,于是县政府在当天召开了协商会议,地点在县委常委楼。内容主

要有:一、谁停工谁负责,砖厂的停工要停多长时间?二、保护的确切范围和继续取土范围,三、经济赔偿问题。会上我们强调祭祀坑所在的台地决不能再取土,否则会破坏整个遗址的完整性,砖厂即使要恢复生产,取土也必须在考古人员的指定范围内进行,关于经济赔偿方面,省市县三级政府都可以承担部分。同时也提出了整个三星堆遗址的保护问题,遗址内的十余个砖瓦厂根据我们的调查都涉及到文物的保护问题。关于几个农民工的工时补偿问题由我所承担。这样一来,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广汉县的陈县长、宣传部的胡部长、南兴镇的李书记、三星堆砖厂的林厂长、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发掘依然在进行,在经过一天的打隔梁的清理工作后,最终把二号祭祀坑的整个平面布局找到,该坑属一个长方形的土坑,没有坑道,方向为北偏东35度,祭祀坑长530、宽220厘米。下午16点开始挖坑里的填土,坑里的填土为五花土,也轻过夯打。

8月26日 通过昨夜和今天上半天的取土,在坑的南边出现了一件大的铜器,成半圆形,但不知道是什么器形。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接着又发现了大量的遗物,能辨别的有铜头像一个、铜尊两个、大铜鸟头一个、大铜援一个、还有十几枚象牙。这些器物形体大,是以前都没有见过的,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吃惊。但最早发现的半圆形大铜器由于还没有清理到一定的深度,其面貌仍是一个谜,由于它的体积很大,又有一定的幅度,从目前的形状来看,很像一把“椅子的靠背”。

8月27日 最早发现的大“铜椅靠背”终于露面了,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铜面具,就一只耳朵就有28.5厘米。接下来有不断的新发现,首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满坑的象牙,在象牙的下面覆盖着大量的青铜器。在象牙的中间有一只巨大的手也伸了出来。看着满坑的象牙既是喜又是忧,喜的是千载难逢发现如此多的象牙,忧的是这样多的象牙既被火烧过,又被夯打过,加上又在地下埋葬了几千载,其保护是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决定下到坑里工作的人的体重不能太重,同时要求民工赤足下去,避免过多过重的踩踏给象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坑内到处布满了文物,人下去都只有慢慢的找空落脚。

8月28日 在坑的南边开始发现海贝。另外

为了留下野外的实地情景,我们决定对二号祭祀坑进行场景雕塑,单位同意该意见,派李建伟等人到现场准备把二号祭祀坑的堆积情况用立体的雕塑手法把它保留展现出来。

8月29日 我们一边清理,一边进行现场的绘图、摄影。下午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雕塑工作开始,模型是原坑的四分之一。晚上对坑里第一层的象牙进行清洗,准备对象牙进行现场保护。此后几天的工作基本上是绘图、照相、雕塑,同时所里的曾忠懋到现场对象牙表面进行化学处理保护,我们期待的是在经过处理后的象牙能在取起时不散架。再下来的清理也是小敲小打,主要是在坑的东北部清理一些灰烬,在这些灰烬中常发现的都是一些金鱼、金饰件等。

8月30日——8月3日 二号祭祀坑上层的象牙堆积的照相绘图完毕。

9月4日 由于前几日的持续高温,使二号坑的坑边干裂,加上昨天的大雨浸泡,坑壁发生了倒塌,我们把倒塌的泥土清理后用塑料薄膜铺在坑上搭在坑壁上,以便减少坑壁水分的蒸发(发掘完毕证明这个方法很好,坑壁没有再发生倒塌)为了更好的清理象牙下的文物,下午开始取象牙,至五日,共取象牙69枚,由于象牙多方面的原因,取出来的象牙几乎没有完整的,也就是说散了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上层象牙取完后,展现出来的是满坑大大小小的青铜器,而且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明显的朱砂色。

9月6日 青铜面具和青铜人头像越来越多的露了头,在坑的西北角发现了头戴金面具的青铜头像,还在坑的中部偏东的地方发现“车轮”两件(太阳形器)。

9月7日 今天把一些原来看上去是树枝的东西也明确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就是人们长说的“扶桑树”,在出土的尊、罍中发现装有大量的玉器和海贝。从今日发掘清理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青铜器的分布,尊主要位于坑的东南部有5件(共有7件),罍4件分布在坑的西南部,大面具分布在坑的东南部,人头像约三十余件大部分分布在坑的西部,中部有“轮型器”和大立人像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大立人像的头和足都是东南向。另外还有大量的“三角形”器遍布坑中。

9月8日 在二号坑的中部发现小的青铜人

像,高仅2~3厘米,手中还握有一璋形器作供奉状。其它还有小的怪鸟、怪兽、水牛头和小的果实之类的东西,另外还发现一个枝头上有2个小果实的树枝,在枝近果实的地方还包有金皮。从今天清理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弄清该坑器物的堆积,第一层是堆积象牙,第二层是大件的青铜器,第三层是大件青铜器上的“小零件”及玉石器等。

9月9日 上午清理坑周围的浮土便于照相,下午我们用两个长梯立起来作为高架,下边由几个民工扶助,我带上一部海鸥120型照相机和一部135型的亚西卡相机爬到梯子的顶端照相。

9月10日 下午4点开始取坑里的器物,人员也大致分工,我编号、陈德安记录、朱章义造册、敖兴全装箱、张文彦写标签、郭汉中和民工张有余取器物。在取坑里的器物时,在西北角发现的戴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内装有大量的海贝。

9月11日 继续取坑里的器物,另在坑的东北部发现蛇身的中间部分,在坑的西南角发现蛇头及上半身。倒在东北角出土的铜垂(编号88)口前倒出了大量的玉器,共计62件,其中玉凿32件,玉刀1件,玉珠5件,玉管穿12件、“舌形玉器”8件、方体玉凿8件、玉瑗1件。在出土的人像当中,有的在眼眶和眉间涂有黑色。

9月12日 继续取器物,通常是在取了上面的器物以后又出现新的器物,特别是那些玉器和小型的青铜器、海贝、金器等。今天在取完第123、124、125、126号器形下又发现一个跪座的青铜人像,全身高仅十几厘米。其形体与第一个小人像有些差异,作单膝跪。这种形象有点与成都地区曾经发现过的青铜剑和戈上发现的人物形象相似。在第129号青铜尊的口部发现三条金器,其形象似“鱼”。今天所里李昭和、陈显双等人也参加了清理发掘。

9月13日 到了晚上,第三层的器物基本上清理出来,这些器物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就某些方面而言,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如非常小的铜饰和小动物主要分布在东北边缘的中部,三角形器多集中在坑的中部,神树枝则在坑的东北和西南两端,动物面具则分布在坑的西北角,在坑的东北端最下面是有一层厚约5~10厘米的海贝堆积,在海贝当中又夹杂有不少的碎金皮或金皮鱼。另外在坑的东南发现一个小铜人,头上

顶一铜尊。今天对大的铜人像的上半身(编号149)和有座子的下半身(编号150)都进行了清理,并把“他”抬出了坑进行了身高的测量。大人像连座子身高262厘米。我们把大人像抬出二号坑时可以说是非常费劲,因为没有起重设备,全靠人抬。

9月14日 今天发现的新器形有小的铜鸟、公鸡、小的怪兽、小鸟头、小龙、小树枝等器形。

9月14日 全天绘图

9月16日 上午绘图照相完毕。下午16点30分开始取第三层的器物,至晚上24点收工。

9月17日 继续取器物,至下午17点15分

器物取完,在取完器物后,在坑的中部向东北端均有一层海贝,厚度约5~10厘米不等。把海贝清理完毕,整个祭祀坑的野外作业也宣告结束。

(本工作日记只是个人的记录,难免有疏漏,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只是个人的想法,今天公诸于众,想让大家了解其大致的工作过程,也为野外考古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如与出版的报告有异,请以报告为准。)

(陈显丹)

三、三星堆遗址祭祀出土文物的修复

1986年7月至9月,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金、铜、石、陶、骨、贝等珍贵文物约一千余件。有青铜立人像,戴有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有眼球突出的青铜面具等。还有硕果累累、枝叶茂盛、飞禽走兽聚集其上具有神话传说的青铜神树,属国内商代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坑内除少数保持完整的器物外,多数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且扭曲变形。造成损坏的原因据考古现场分析:1. 入坑前被当事人进行某种活动时所损毁。2. 进行“燎祭”时被人为的敲坏烧毁。3. 入坑填土时经层层夯实被挤压所致。修复完整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大面具至今都还保持被人为敲击的痕迹,敲击力之大,可见不一般。坑内有的铜器的一端或一则被火烧变形或呈半熔化状,同一器物的残片散落在坑内不同的位置,为日后的修复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

1986年12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进行室内整理、清洗,工作极为细致。我们把从铜尊、铜罍、铜头像等器物中掏出的泥土都进行了细筛,从中清理出了金树叶、金箔虎形饰、金皮、小牙璋和骨珠等器物。

1987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的修复全面展开。首先开展的是玉、石器的修复。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虽然埋藏地下三千多年,如今仍然色泽光润、晶莹、细腻,尤其玉戈、玉璋、玉瑗和环等,打磨精细平整,线条流畅,形体宽大而又极薄。可见

古蜀国的工匠大师们对玉石的切割、开片、琢磨、钻孔和打磨抛光等玉石加工工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玉、石器清洗整理时,将玉器和石器分开,大部分的玉石器都是用清水进行清洗,极少的部分还需根据石质及风化程度的各异采用无水乙醇或丙酮进行沾洗。清洗时,特别注意那些器物表面粒化易剥落粉末的器物的清洗。避免由于操作不当或采用的方法的错误造成人为的损坏,为修复工作增加难题。用水清洗只是清除玉石器表面的泥土,而附在玉石器表面或断茬口的铜锈,象牙残渣、兽骨及贝类残存物都使用牙科台钻逐一的进行仔细的打磨和清理,尤其是断茬口或裂片中凸凹处的异物,直至断茬口完全合缝,平整后才能进行粘接修复。修复中玉石器的补缺采用环氧树脂加入适量的石英粉作填充料配予颜料作成环氧膏泥来补缺,膏泥中加入的颜料的深浅、色调搭配要根据所修玉石器的色调而定。环氧膏泥的可塑性很强,易于操作,在三星堆玉石器的修复中被广泛的应用。为了尽可能的做到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还要进行打磨抛光,使所修的部位光亮程度达到或接近玉石器光润和细腻的效果,抛光时用绒布蘸上光蜡用手工进行抛光,直至光亮。有纹饰的部分用小刀具雕刻出相应的纹饰,一件玉石器的修复工作才算完成。共修复璋、戈、瑗、凿、斤等各类玉器223件,璧、瑗、戈、矛、斧、铲等各类石器81件。

三星堆青铜器的修复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文物修复的重点。出土的青铜器约占出土文物总数的40%左右,其中70%的需要修复。要修复的青铜器大都严重变形、扭曲、被敲碎或打瘪,氧化锈蚀程度相当严重,修复相当困难。

整形工作是铜器修复中的难点之一,是最细致、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特点,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整形,分别采用挤、敲、箍和分解法等,修复了青铜头像、青铜面具、铜尊、铜罍等80余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星堆青铜器的修复以传统的锡焊法为主,配合铆、粘等辅助工艺。焊接的方法采用镀锡焊、加银钉扣焊、点焊、撬压焊、对口焊等多种焊法交叉进行,保证了焊接修复的质量。共修复完成青铜头像40余件,青铜面具23件,铜尊、铜罍10余件,三角眼型器80余件,铜兽面具、铜太阳器、铜戈、铜瑗等青铜文物100余件。

1990年,当我们修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决定修复金面罩铜头像。金面罩铜头像氧化程度相当严重,为了使其不致松散失去原状,发掘人员给头像内灌注约占 $2/5$ 空间的石膏,修复时用清水浸泡后,用带刃的工具手工清除。铜头表面的土锈,采用机械去锈的方法进行清除。金面罩的揭取用竹、木质工具配合微型牙科电动工具交叉进行,做到一动作轻、二留心观察、三仔细操作。青铜头像由于氧化锈蚀严重,不能进行有效的焊接,因此只能采用环氧树脂粘合修复。其主要要求是要掌握铜头残片对茬碰缝的空隙要小,铜头不能有丝毫的尺寸改变,以便准确把金面罩还原到铜头像上。金面罩要经过回火处理,把皱折的部位按压平展,整形复原,最后用 α -氰基丙烯酸乙酯粘合剂将金面粘贴在铜头上。粘合时,要掌握粘剂的有用量,不要涂抹过多,以免造成对金面罩的污染。金面罩铜头像的修复成功,为研究古蜀先民的宗教观念、魂灵观念和等级观念提高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大面具(K2②148)是三星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物,是青铜文物中最早修复之一。先是采用传统的锡焊法进行修复。1997年,青铜立人像出现了脱焊现象,同时有裂纹和凹陷的情况发生,随时威胁着文物自身的安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星堆博物馆共同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青铜立人像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制定出了新的修复方案。一致认为青铜立人像必须及时进行加固修复,决定用粘胶与铜螺钉铆接加固的新工艺取代以往传统的锡焊法。方案报四川省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实施。这次加固修复时,把后期在三星堆文物残片中被确认的8块残片修复还原在立人像上。新的加固修复方法使立人像得到了很好的加固。加固修复后的立人像,不再象以往那样即使挪动一寸都要动用很多人力,现在只需两人便可轻松移动,方便了陈列展览,包装运输也让人放心,立人像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加固修复后的立人像频频出展先后在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展出。虽经多次的包装,搬运,立人像均未受到损伤。立人像的加固修复是成功的,为今后修复大型青铜文物探索出了一个新的修复方法。

三星堆文物器物的大小差距很大,青铜器中有仅有3厘米高的青铜跪人像,有高达2.6米的青铜立人像和3.95米的一号青铜神树。再加上氧化锈蚀的程度不同,决定了修复方法也各异。在修复青铜神树时,除一部分用传统的锡焊法进行修复外,还采用铆与焊,粘与焊等工艺交叉使用,并从树干、树枝内添加铜管,灌注环氧树脂来增加神树的抗压、抗弯强度。根据神树修复方案,我们对神树的加固方法,修复用的材料进行了模拟试验,取得了准确的科学数据,证明了我们采用修复方法,使用的材料是切实可行的。达到了提高神树的抗压、抗弯、抗拉的机械强度的要求。

青铜神树是我国商代考古第一次出土的超大型青铜文物,神树的形体资料无从可查。为了准确掌握神树的形体,恢复原貌,把握正确的整形,为修复神树提供较为准确的标准。我们在室外多次进行了神树的预合,保证了神树修复的科学性,提高了神树的修复质量。

三星堆文物的修复工艺,使用的修复材料是否得当,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得到最终结论。不可置疑的是三星堆文物修复在全国仍然有着它的影响力。时代在日新月异地前进,为了跟上前进的步伐我们需要更先进的修复技术、更新的修复材料,把我们的修复工作提高到一个更深

的层次。也希望得到各位先生、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本着为文物,为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三星堆文物种类的多样性,为培养复合型的文物修复人才提供了极好的有利条件,通过三星堆文物的修复,培养造就了一批既能修复陶器、玉、石器又能从事金器、铜器修复的全方位的文物修复人才。

三星堆文物的修复至今已20年了,我有幸主持和参加整个文物修复的全部工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感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领导和从事三星堆文物考古的专家学者对我的信任、关心和指导,感谢参与三星堆文物修复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杨晓邨)

四、感言

马继贤(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座“器物坑”发现大批青铜器和精美玉石器的消息甫经公布,即震惊了世界。至今凡是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的中外游人,无不被它们奇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和恢宏的气势而震撼。以它们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更是中外学者们多年来一直热烈讨论的重要课题。这批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先秦时期,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上存在着—支具有独特文化面貌、在时代上与中原的商文化同时发生发展的灿烂的青铜文明。这就改变了过去学者们以夏商文化为中心来思考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传统观念。再一次证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多元性,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这支青铜文明,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三星堆遗址更多遗物的出土、分期工作的深入以及城墙的认定,证明这里应是一处古代一个王国的都邑所在。这个王国也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三千多年前在川西平原上创造过辉煌的古代蜀国。虽然目前学者们还不能把这座古都与文献中所记的古蜀王朝世系的某一王世确切认定,但它为这种探索提供了可能。随着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各种观点的交流,也使学者们逐渐把目光转向了追寻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传承以及与周边地区各种文化遗存的关系上。近十年来在成都平原上包括古城址群在内的发现,以及对峡江地区乃至汉中盆地一些具有三星堆文化内涵遗存的认知,不能不说都与两座“器物坑”发现带来的启示有关。可以说,“器物坑”的发现,是四川考古史上—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今天,在纪念三星堆“器物坑”发现20周年的

时候,我又想起了1963年月亮湾的发掘。当时身为省博物馆馆长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冯汉骥先生,根据对上世纪30年代的重要发现以及解放后多次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这里应是一处重要的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址;东、西、南三面连绵起伏的土埂围合的范围可能是一座古城址,搞清楚这些问题,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乘川大学生实习的机会,先生亲自出面协调,由省馆同志和川大考古专业师生联合组成考古队首先对月亮湾进行试掘。我们当时把发掘点选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是估计这里堆积可能比较丰富,既有利于学生实习,也可以获取较多资料。同时,还对月亮湾的梁子作了解剖,看它是否是城墙,测绘地形图时把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内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一切都是为以后的继续发掘作准备。虽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它毕竟是自30年代玉器发现以后,在月亮湾进行的一次真正意义的科学发掘。当时出土了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发掘有了—个良好的开端。

令人欣慰的是,23年后的1986年,三星堆遗址终于有了惊世发现,合作代替了猜忌,彼此切磋驱走了攻讦。在年轻一代学者的努力下,古蜀文明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生当年的愿望正在他们手中实现。

宋治民(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

1986年盛夏,传来广汉市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发现大型祭祀坑的消息,承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组织在校教师前往参观学习。时1号坑已经清理完

毕,当时看了1号坑的遗址及金杖等出土器物,根据坑的形制和出土的金杖,给人以非同一般的感受。同年10月在广汉召开了“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有机会看了发掘经过和出土铜器的录相。至此算是对祭祀坑有了初步的、肤浅的了解。感觉这一重大发现是惊人的,将把古蜀历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29年春季在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发现了一个窖藏玉器坑,引起人们的注意。1963年秋冬在遗址内的月亮湾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发掘,虽无重大发现,但却出土了一些石璧以及石璧的半成品、残次品和制造石璧留下的石芯。说明这些石璧就是在这里生产的。石璧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用品,结合玉器坑的发现,感到这一带可能有重要的遗迹。随后1964年、1967年相继在这里发现玉石器坑和磨石坑。由于这里的玉、石礼器和中原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说明古蜀和中原早有联系,并且社会的发展大约已进入阶级社会。

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似乎为上述发现和认识作了一个总结,可称为是里程碑式的发现,因为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我们知道都邑遗址和一般遗址是大不相同的,应是当时蜀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圣地。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金器等绝大多数属于礼器和宗教祭祀用品,就是很好的证明。

说两坑的发现是里程碑式的,绝非夸大之辞,因为给我们提供了古蜀多方面的信息。首先,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物质文化标本,使古蜀历史的研究突破了仅据少量文献资料的框框,虽然证实蜀的存在,但又说不清楚。现在有一大批具体的古蜀人留下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拓宽了研究的领域。

其次,通过对实物的观察,用考古学的手段探索古代蜀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宗教思想等,这些就是古代蜀的历史,并且是实实在在的、确凿可靠的古代蜀的历史。

第三,通过对青铜器、玉器等研究,加上两坑本身就是大型礼仪性建筑,结合遗址规模宏大的夯土城墙,这就证明了古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一提法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新的课题和内容。

第四,从两坑出土青铜器、玉器等来看,不少模仿中原商周文化的器物在蜀地制造的。这就说明古蜀王国和商周王朝是有多方联系的,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而且是在社会意识、精神生活方面都接受了商周文化的影响。从而显现出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区域性文化,是商周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科学证据。

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两祭祀坑发现的重大意义,仅属个人的几点想法。两个祭祀坑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古代蜀的历史,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组成部分,乃至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她不只属于四川,也属于全国、全世界。我们有义务保护好她,而没有权力使她遭受到损坏。

林向(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与考古发掘引发了海内外各界持续的“三星堆热”,二十年来其轰动效应,至今意犹未尽。几十年前默默无闻的广汉三星堆,如今成了学术界的热门,旅游业的明星,观者如鲫,著述如雪。但冷静思索一下,你会觉得对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其社会效应更有待于进一步的正确评估和引导,需要去做的事还很多很多,诸位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和中肯的建议,这里不拟赘述。

笔者感到有几件事是迫不及待的:第一、三星堆考古资料的全面公布与消化;第二、三星堆遗址和已出土文物的保护与正确利用;第三、尽快成立三星堆研究院和扶植科学研究人员。其中尤为迫切的是考古资料的及早整理与公布。否则,多少人的辛劳、数十年积累的宝贵资料,因为时过境迁、人员的变动而造成散失,以致前功尽弃,这是大家最不愿看到的。

最近收到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星堆图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迄今看到的有关三星堆遗址的相对最全面的著录。全书分为“三星堆文物志”、“三星堆考古志”、“三星堆学术志”、“附录”四部份,图文并茂地对1929~2002年以来三星堆遗址群的发现经过,历年来包括祭祀坑在内的全遗址出土或采集的遗迹、遗物,考古工作和文物修复的过程,博物馆的修建,

陈列展出和出国交流,学术会议和论著目录……等等,都尽可能一一全面的作了著录,能够达到“盛世修志,继往开来”(张中伟省长语)的目的。我相信这对于三星堆遗址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也会是十分有益的。

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公布了除祭祀坑以外的发现资料,包括1986年春我们发掘的部份资料,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供研究的最急需的新资料。全书未及细读,信手拈来,举例说明之。如公布1984年出土于月亮湾台地北坡的“斜凹斜牙璋”(可惜图页未印页码,翻检当十分困难),显然与一、二号出土的牙璋形制不一,而与1929年燕家院子出土的相同。笔者曾在《古蜀牙璋新论》(1994年)中指出,燕家院子出土的牙璋C/4688属于I A1典型牙璋,年代为夏商间,早于祭祀坑出土的I A3型,属于商代的牙璋,并推论出:“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即可能是(牙璋)最早的发源中心”。今有新材料,可能更指明三星堆遗址的早期遗迹可能在北部的月亮湾一带的台地(包括燕家院子旧地点)上,有待检验。又例如发表了1986年春发掘出土的“陶靴”,“泥质红陶,酷似陶塑着履的人足,中空如靴。”据说1963年月亮湾发掘也曾出土一件(见206页)。类似的陶靴曾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见到过,暗示着三星堆古蜀文明与西北中亚有密切的文化关系。过去大家只注意三星堆大立人像是跣足站立的,认为是南方民族文化的反映,现在遗址里出土陶靴了,那末祭祀坑里的跣足大祭司,难道是因作法时的需要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文化含义?值得探索。

从此由小见大,可见一斑,考古资料的及早整理与公布,对进一步探讨三星堆文明会有多么大的帮助呵!

孙华(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引起中外考古学家的注意,具有远见卓识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指出了该遗址的重要性。受到前辈学者思想的启发,那时的四川考古界已经有多位学者将三星堆遗址当作了解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和历史的关键,因而才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对该遗址的连续多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不过,直到1986年,当两个掩埋有大量珍贵文物的器物坑被发现

后,三星堆遗址才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代遗址之一,才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艺术史和先秦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仅仅从发现的角度来说,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和清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四川先秦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中原与周边关系的架构,推动了夏商考古和历史研究走向深入。

在没有文字的考古材料中,研究者要考察古代遗存所反映的当时的宗教状况,通常是相当困难的,他们能凭借的材料主要是相对复杂的艺术造型和图像材料。先秦时期中国的中心地区的主要艺术类别是相对抽象和简约的各种各样的容器和相对图案化和程式化的纹样,它们能够反映的当时精神领域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研究者往往要借助文化传统、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来对这些器物 and 装饰进行解释。三星堆两个装有造型奇特的青铜神像、多种发式的青铜人像、内涵丰富的青铜“神坛”、高大繁复的青铜神树、造型各异的青铜鸟兽、数量巨大的玉石寺像、内涵丰富的青铜“神坛”、高大繁复的青铜神树、造型各异的青铜鸟兽、数量巨大的玉石圭璋、具有特别寓意图案的黄金杖等文物,都包含了丰富的可以通过视觉观察而得到的信息。如果再联系到后来蜀地流传的传说和晚期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不同的信息点连接成一幅比较清晰的历史画面,从中可以得到这个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国的许多历史资料。正由于三星堆器物坑展示给人们这样多的前所未有的历史信息,才会有这样多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关注它和研究它,甚至连一些没有受过考古学和历史学训练的爱好者也基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给三星堆器物坑的一些现象进行解释了。

当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清理简报公布以后,围绕着这两个器物坑及其器物,研究者随即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三星堆这两个坑的年代关系、埋藏性质、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种种推断和解释。从三星堆器物坑发现以后,三星堆不仅是学术界,同时也是新闻界和公众都感兴趣的热点话题。由于三星堆文明是一种被后世文献几乎遗忘的文明,尽管三星堆器物坑本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因为缺乏文献作为解释的直接依据,对于上述问题,研究者的意

见差异很大,远未统一。对于同一问题的解释众说纷纭的另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三星堆器物坑的器物数量众多,掩埋前遭到了火烧和外力的严重损坏,资料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遗物和遗迹现象本身传递的信息错综复杂,给理解和解释造成了困难。除此以外,当三星堆器物坑被发现后,考古学家和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力完全被坑内种类繁多的前所未见的精美文物所吸引,一度忽视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报告的长期不能公布,以及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论文较少,使得两个器物坑的信息未能很好地与遗址其他遗存提供的信息相互参证,反过来妨碍了两个器物坑本身研究的深入。因此,三星堆器物坑还有许多基础研究工作要做,将来定有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肖先进(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回首三星堆博物馆事业初创与发展历程,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两个祭祀坑面世是密不可分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前提。另外,各级领导的关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技术支持、博物馆职工精勤务实的工作作风也是三星堆博物馆事业成功的基础。

博物馆前期筹备阶段,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博物馆选址问题。权衡再三,我们明确提出应将集中收藏和展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三星堆博物馆定位为遗址博物馆,突出其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首先,作为专题博物馆,其与遗址的关系是相互依托、相得益彰的。若馆址与遗址在空间上相脱离,则颇不利于“三星堆”文化品牌形象的整体架构。

在完成了馆址及馆名的论证后,我们又紧张而有序地完成了方案征集和设计、土地征用和圈定及馆区地质钻探、部分建馆资金的筹措等工作,并积极争取到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顺利完成了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的修筑,促使了市区至三星堆博物馆专线旅游公路的修成。博物馆终于在1992年8月破土动工建设。

在博物馆整体架构和经营思路,建馆之初,我们即明确提出三星堆博物馆应走“馆园结合”的创新之路。筹建前阶段,我们到国内大城市考察了当地博物馆后在博物馆整体规划与经营策略上

大胆提出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应冲破传统思想束缚,以“馆园结合”的模式为博物馆整体架构馆的理念。“馆园结合”即文博事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亦即将三星堆博物馆定位为融历史博览、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在突出博物馆专业学术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旅游休闲功能。努力营造馆外环境,积极拓展功能外延,保护与利用并举、文化与旅游争辉,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市民生活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修建遗址博物馆最大的问题是资金困难。但我们一方面深刻认识到三星堆文物的重要性,一方面对“馆园结合”之建馆理念颇有信心,在建馆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从财政、金融部门乃至民间借贷款。总共投资3100万元的博物馆,借贷款竟达1500万元,这在全国文博界可谓开先河之举。正是有了资金后盾,也才保证了以博物馆主体建筑与主体陈列为核心的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博物馆的核心在于陈列展览,规划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时,我们认为:博物馆不应只是针对专家学者,而应面向大众、服务社会,陈列展览要真正发挥出博物馆的文化功能、产生实效,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结构、不同国籍肤色的游客的需求。否则,便是不成功的博物馆。

为确保陈列总体设计成功,我们邀请我省文博专家陈显丹先生与樊一先生共举陈列总体方案设计一事。初稿完成后,我们在设计理念上进一步达成共识,具体想法更趋成熟,一致认为,陈列展览在遵循学术原则的前提下,应尽量增加故事性、观赏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等以吸引广大观众。若陈列展览不能招徕游人,则精神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无异于纸上谈兵,故本馆陈列展览应力求在内容设计和展品组合上创新。陈列形式总设计则延请我省资深博物馆形式设计专家夏大正先生担任。

在“面向社会,服务大众”这一建馆指导思想下建成的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10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后,其全新的面貌一开始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匠心独运的陈列展览获得社会各界普遍好评,并于次年荣获首届全国文物系统“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毫无疑问,追求艺术性和科普化双美互融、实现服务大众之目的的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适应了新时代新观念对博物馆陈列的新要

求,该陈列的成功系三星堆博物馆在业内大放异彩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星堆博物馆自开馆以来,经过9年多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外展、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大促销活动及主流媒体的强势宣传等,使三星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数持续增长,博物馆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赞誉。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尉建行、李岚清等曾先后莅临参观视察,他们盛赞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辉煌成就,高度评价三星堆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并对三星堆博物馆事业的未来发展寄予了殷切期望。实践证明,三星堆博物馆是一个高起点、高品味的博物馆,是一个深受社会各界和中外游客好评的博物馆。其建成开放,堪称四川文博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施劲松(《考古》编辑部,研究员):

就中国考古学而言,20世纪或可称之为“发现”的世纪。在层出不穷的重大考古发现中,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两个器物坑无疑是最令人激动和震撼的。但相对于一时的激动与震撼,这项发现所具有的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基于一些考古发现而提出的巴蜀文化开始进入学术视野。不过直至八十年代,成都平原商时期的文化面貌仍然不为人知。直至两个器物坑的出土,人们才得以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曾经存在的文明。或多或少地以此为契机,成都平原的一系列史前城址和金沙等周代遗址在此之后也相继被发现,从而使人们在找寻三星堆文化源流的同时,也以三星堆为基点初步构建了成都平原从史前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

但三星堆这一发现的意义远非如此。由于这

两个埋藏丰富的器物坑的出土地点与过去观念中的文明中心相距甚远,因此这一发现动摇了传统的历史观。尤其是紧随三星堆的发现,在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又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墓,两者一同改变了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商代的文明图景。

因三星堆的发现,成都平原存在一个商时期的区域文明已无可怀疑。与其他区域文明相比,三星堆文化显然与商文化截然不同。比如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两个器物坑似乎传达出了在三星堆文化中王权与神权并存的信息。具体而言,三星堆一号坑中以青铜人头像为主的各类器物可能出自宗庙,反映的是祖先崇拜;而二号坑中的青铜人像及铜树、太阳形器等具神话色彩的器物则可能出自神庙,表现的或许是太阳崇拜。在中原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并无类似的太阳崇拜和相应的神庙,因此三星堆文化在显示出其独特面貌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当然,要对三星堆的发现得出合理的解释并接近历史的真实并不容易,20年来围绕它所进行的热烈讨论以及所存在的巨大分歧也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三星堆的很多发现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我们也缺乏有效的对比资料和研究途径。这一情形足以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应当如何研究周边地区的考古材料。而通过三星堆器物坑这样一个典型个案,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出用以考察周边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方法。

一项考古发现的学术价值、意义,以及它所引发的问题,往往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地显现出来。面对三星堆的发现,我们在保持探索热情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的理性与思考。三星堆器物坑出土时带来的惊喜已留在了20年前,而两个坑埋藏的历史真实则永远在我们的前方。